

任弼时百周年纪念

——全国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下)

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
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任弼时百周年纪念：全国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

ISBN 7 - 5073 - 1834 - 6

I . 任… II . 任… III . ①任弼时 (1904 ~ 1950)
- 生平事迹②任弼时 (1904 ~ 1950) - 思想评论 - 文集
IV .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7693 号

任弼时百周年纪念

——全国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上、下)

编 者/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

责任编辑/李庆田

封面设计/张 戈

版式设计/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经销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850 × 1168mm 32 开 31.5 印张 790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ISBN 7 - 5073 - 1834 - 6 定价：100.00 元 (上、下)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略论任弼时的实事求是思想作风

龙 峰

任弼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严谨的工作作风、丰富的工作经验、高尚的思想品德，是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坚持真理、坚持原则、遇事重调查研究、善于在复杂的斗争中把握方向、求真务实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这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任弼时同志的工作作风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实在。他历来注意调查研究，严格尊重事实，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敢于实事求是。他头脑冷静，思维缜密，办事细致周到，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问题。”^① 本文拟就任弼时的实事求是思想作风作一些分析、研究和探讨，以纪念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诞生一百周年。

一、湖湘文化的熏陶是任弼时实事求是思想作风的深厚文化底蕴

实事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

^① 《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页。

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①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的命题，以及对这个命题所进行的科学阐释，与湖湘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湖湘文化源远流长。从古到今，爱国主义始终是湖湘文化的主旋律，而经世致用的学风，则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特色，如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胡宏的“致知力行”，张栻的“贵实用而耻空言”，王船山的“言必证实”，陶澍的“经世实学”，魏源的“师夷长技”等，都是湖湘文化重视实际的典型表现。

一般而言，一定区域内某些极具特色的传统学风往往会积淀为若干文化基因，并绵延流传，对该区域的历史、文化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思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湖湘文化崇尚理义，强调经世致用，主张社会变革和匡正社会积弊，这些优良传统，在毛泽东、任弼时等湘籍伟人身上都鲜明地凸显出来。可以说，任弼时实事求是思想作风的形成，与湖湘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密不可分的。

湖湘学派自创立之初就反对迂腐学风，强调“践履”。程颐、程颐主张“穷理将以致用”。胡宏指出：“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王阳明注重实用之学，主张“以理学抒经济”，倡导“当今所急在务实不在炫名，在躬行不在议论，愈笃实，愈光辉，愈易尚，愈广大。”曾国藩则用实事求是的学风贯穿到一生的治学治事之中，信守“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任弼时从小就在这种历史文化氛围中成长。青少年时期的他，生活在屈原投江的地方，他的家唐家桥距离屈原故宅仅几十里，父亲经常给他讲述屈原的故事。读书之余，他经常寻访古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801页。

迹，凭吊古人，探求国家和民族的兴盛之道。任弼时的同乡左宗棠和郭嵩焘则是近代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左宗棠“湖湘子弟满天山”，69岁高龄还“舆棹出关”收复新疆，他提倡“多读经书，博取义理之趣；多看经世致用之书，求诸事物之理”。郭嵩焘59岁时，奉命出使英国，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他将“实事求是”与西方近代科学精神相统一，认为“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①这些人物的思想、品格和精神对任弼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使任弼时在青少年时代就具备了求实的品德，并养成了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的良好习惯。任弼时在序贤初等小学的作文《民生在勤》就流露出勤劳、求实的思想火花。而在《说运动之益》一文中，任弼时首先谈了运动有益身体健康，但在文章的结尾却辩证地提出：“吾人在校固以运动为贵，尤宜适中，则有益于身心矣。”指出运动过量对身体不宜。这充分反映了任弼时认识事物的客观态度：对于新生事物，他去实践，对其益处给予充分肯定；但是他不片面，不绝对，善于从中觅得正确的态度。^②1915年夏，任弼时在序贤小学初小毕业，来到湖南一师附小求学。他在这里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深得湖湘文化精髓的有识之士。在他们的影响下，任弼时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进步活动，孜孜地读书、阅报，在忧国忧民的困惑中强烈地盼望和寻找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的出路。1918年，“在《言志》作文中，他认识到在科学发达、竞争激烈的历史潮流中，振兴中华民族，必须发展工业。”^③在长郡中学

① 《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766页。

② 《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19页。

③ 《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8页。

求学期间，任弼时怀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忧国忧民，针砭时弊，萌发着对社会问题的强烈参与意识。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组织参加湖南学生联合会，进行罢课斗争，当长郡中学责令学生“限期离校”时，任弼时联合长郡中学、明德中学、第一师范、甲种农业学校的湘阴籍同学一起组织一个宣传团，回湘阴老家以演讲、散发传单、演出活报剧等形式向民众进行宣传，投身到实际的斗争行列。后来，在五卅运动中，他号召青年到民众中去宣传，并写道：“这种普遍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学生界应负大半责任，因为学生多为四乡集中于城市的，每逢寒暑假时节，学生回到乡村的时候，应该努力在农民中活动。”^① 这既是任弼时从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也是湖湘文化传统中“知行合一”、注重实际的具体体现。

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任弼时实事求是思想作风的深刻理论基础

任弼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1920年8月，16岁的任弼时在长沙由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介绍，加入由毛泽东等发起组织的正在筹建中的俄罗斯研究会，并由该会推荐首批入上海外国语学社作留俄学习准备。此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的上海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外国语学社成立，任弼时是首批团员之一。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任弼时就开始接受马克

^①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2页。

思主义的基本教育，并开始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① 1921年5月，任弼时等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于8月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下简称“东大”）中国班学习，并于1922年底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抱着坚定信念“到列宁的故乡去学习革命”的任弼时，在东大这座大熔炉里得到了各方面的锻炼。1921年7月，他刚到莫斯科时，就被安排和同学们轮流列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2年初，他出席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于年底接替瞿秋白担任东大中国班西方革命运动史课堂翻译；1924年1月，他被安排代表东方民族为列宁荣誉守灵；1924年7月，他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些重大的政治活动，开阔了任弼时的政治视野，使他把中国的革命和远东以至于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进行观察和思考。此外，1923年初，中共旅莫支部成立后，对党员、团员进行了严格的党性教育和训练，制定了《旅莫党团训练具体方案》、《旅俄中国共产党支部与青年团支部的关系和权限》等，要求党团员树立无产阶级人生观、反对无政府主义、服从大局、开展自我批评、刻苦耐劳等。同时，中共旅莫支部还注意加强对党团员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并利用各种机会建立与国内实际斗争的联系，关注国内党的建设和斗争形势；利用各种机会参加共产国际的各项活动，了解苏维埃创建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和各国革命斗争的经验。任弼时置身其中，积极参与。因此，这些严格、系统的党性教育和训练，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1920年任弼时在上海加入青年

^① 《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9-20页。

团是树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开始，那么在东大三年正值任弼时世界观形成之际。严格的党性教育和系统的无产阶级理论学习，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社会生活和旧中国状态的鲜明对比，不但坚定了他的共产主义信仰，提高了他的政治思想水平，而且使他的奋斗目标形象化。同时，对他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及视野开阔、头脑冷静、思维缜密的领导者风范的形成，影响是深远的，受益终生的。”^① 因此，东大三年的学习生活，坚定了任弼时的政治信仰，奠定了他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坚实基础，培养了他坚强的党性，使他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这一切，都是促使任弼时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形成并得以坚持的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

任弼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革命斗争重要的“方法和工具”，必须运用这个武器“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反对不切实际地“仿效俄国党的经验”。^② 他说，共产党员要掌握马列主义，要对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无限的忠实和坚定，“要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不要不顾实际情况，只唱高调，套公式”。^③ 延安整风时，他进一步指出：精通马列主义决不是背诵词句和公式，而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提出和解决革命运动中的实际问题”，从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了解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找出主要矛盾的环节，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④ “真正的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来认识客观规律，这种规律

① 蔡庆新：《历史的选择——任弼时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背景初探》，《人民日报》，1999年4月27日，第11版。

② 《任弼时选集》，第4页、第1页。

③ 《任弼时选集》，第234页。

④ 任弼时：《学习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笔记》，《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第8页。

便是真正的理论。许多斗争经验的综合，并加以运用，这便是理论”；“理论与实践联系，便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便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① 任弼时通过总结建党以来 20 年的历史经验，阐明“根本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即如何使理论与实际真正联系的问题”，^② 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达到全党的思想统一。没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可能有这样深刻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任弼时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进一步地凸显出来，成为其人格力量的最闪光点。

三、不断的革命实践和实际工作的 锤炼是任弼时实事求是思想作 风的强大现实基础

任弼时在 30 年的革命生涯中，在许多部门和关键岗位上工作过，不断的革命实践和实际工作的锤炼使他逐步成长为一名注重实际、实事求是的领导者。

1925 年 1 月在团的三大上，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主任（5 月任团中央代理总书记，7 月任团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同年 2 月 18 日，任弼时给尚在莫斯科学习的罗亦农和王一飞写信，深感在莫斯科的学习多是普遍的理论，没有注意对实际的研究。他写道：“此次回国的同志……从工作中可以看出，多是缺少实际经验，尤其对于很普通党团及工会组织工作，因我们在莫时没有注意实际研究，以致不够应用，甚至较国

① 《任弼时传》（修订本），第 576 页。

② 《任弼时年谱》，第 407 页。

内实际工作者尤为幼稚。”^① 共青团三大后，任弼时在《中学校刊》上发表《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一文，对团的建设的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和斗争策略作了系统的阐述。他写道：“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是：一要使团体能群众化，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三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他强调要“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庶可得到思想上的胜利。否则，对于我们的发展有很大的危险。”^② 这足以说明任弼时在初期的革命实践中，就非常注重实际情况，对教条式地学习马列主义不满意，要求理论联系实际来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随后，任弼时率领广大团员和青年参加了规模空前的五卅反帝斗争。在斗争中，任弼时提出：团“是一行动的群众组织，并不是一种学院式的研究团体，就是研究也不仅是靠着书本上的理论，而是要在行动的奋斗过程中，方可得到真正而有益的经验”，他要求每个团员参加一项组织分配的工作，“努力于主义上的训练”。五卅反帝斗争是任弼时回国后的第一次斗争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了他，实际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促使 21 岁的任弼时在政治上一部一步地成熟起来。在五卅运动的全过程中，他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以及脚踏实地地在斗争中壮大革命力量的认识是比较深刻和自觉的。^③ 这种脚踏实地、理论联系实际的求实态度，成为任弼时工作作风的重要特点，贯穿其光辉一生。

1927 年 4 月，在中共五大上，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他坚持真理，敢于抵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几次代表团中央向

① 《任弼时传》（修订本），第 71 页。

② 《任弼时选集》，第 2-3 页。

③ 参见《任弼时传》（修订本），第 89-90 页。

党中央提出正确的主张，力图挽救党的危机。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奉命到湖南指导工作，他从实际出发，批评了盲动主义倾向，果断停止了第二次长沙暴动计划。

1931年被派到中央苏区后，任弼时曾一度执行了王明“左”倾错误政策，但他很快认识了错误，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朱德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①在领导肃反工作中，他坚持实事求是，正确评价干部队伍，加强党对肃反工作的领导，保护了许多好同志。在湘赣的广大干部中，任弼时始终被认为是党政军有威信的领导核心。王震在《红六军团小史》中，称任弼时为“苏维埃工作和党的政策的最正确的指导者和领袖”。

从中共六大以后到1935年，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王明等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任弼时在这期间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但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实事求是地对待具体问题，多次抵制中央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左”倾错误。1934年8月，李德要红六军团到湘桂边，和广西军阀打仗，当时作为党中央代表和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弼时没有执行这个命令，而是率红六军团转往贵州与红二军团会合，从而避免了被敌人消灭的危险。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李德再三电令两军团分开行动。任弼时从实际出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贺龙一起作出了两军团集中行动，向湘西北寻求新的发展的正确战略决策。

1936年11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任弼时为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和彭德怀统一指挥除西路军外的红

^① 夏远生：《任弼时与毛泽东的交往关系》，《毛泽东思想论坛》，1994年第1期。

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各部及其他兵团。西安事变爆发后，以彭德怀和任弼时为核心的前敌总指挥部及时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建议，调整行动部署，力促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战略格局的形成。当亲日派何应钦调兵遣将，从潼关进逼西安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集中主力、兵出河南、进逼南京，从军事上配合张学良、杨虎城的战略设想。任弼时等从实际出发，主张红军主力目前不宜出河南，并建议集中主力，就地打胡宗南，巩固苏区，从战略上配合张学良、杨虎城。1937年2月中旬，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连连受挫。为缓解危机，毛泽东准备派出三分之一的力量向西增援。任弼时、彭德怀根据当时的情况，认真分析形势，认为红军主力西出，于军事、政治上均不利，建议用积极的政治交涉办法，或以适当的军事力量威胁青海省会西宁，以求达到救出西路军的目的。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反复权衡，采纳了他们的正确建议，重新调整了援西军的兵力部署。

1938年3月，任弼时担负起出使共产国际的重要历史使命。在共产国际，他除了如实地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阐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配合友军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方针，说明毛泽东的领导正确之外，他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坚决抵制和纠正王明等的“左”倾错误，极力消除“王明是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不良影响，并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为陈郁、师哲、吉合等同志的冤假错案平了反，保护了一批优秀的领导干部。

1940年3月，任弼时从共产国际回国后，即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继而担任中央秘书长、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此时，任弼时已成长为一位成熟的领导者，其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是体现在各个方面。在延安，任弼时是一位“大

管家”，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凝聚了他大量的心血。任弼时虽然早年留学苏俄，接受了许多苏联经济建设的影响，但他并没有局限于苏联模式，他的很多实践认识都是非常符合当时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的。任弼时关于财政金融思想的论述和城市经济建设等思想，都充分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从我国国情出发的实事求是精神。^① 整风运动中，由于康生的错误领导，审干运动发生了严重的偏差。任弼时知道后，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越革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应该实事求是。”任弼时还当着康生的面说：“抢救”运动中，某些地方“左”了点，不是特务的也承认是特务，数目还不能确定……下一步要精细地核实材料。并否定了康生所谓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特务的谬论。^② 正是在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的努力下，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错误得到坚决纠正，整风运动恢复了正轨。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任弼时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发现并极力纠正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使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得以完全纳入正轨。

四、注重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是任弼时实事求是思想作风的 力量源泉

实事求是包含着历史唯物论的内涵，它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在实际工作中，实事求是就是要注意群

① 姚勇：《任弼时经济思想研究述评》，《任弼时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版，第 106、108 页。

② 参见《任弼时传》（修订本），第 627—630 页。

众的情绪、要求，要和群众打成一片。^① 毛泽东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他的至理名言。调查研究和密切联系群众之间有着现实的逻辑联系，二者密不可分，任弼时是一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作风严谨、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深深懂得调查研究和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和二者之间的关系。他所作出的决策和提出的政策都是建立在反复调查研究 and 了解情况基础之上的，因而也是实事求是的。

任弼时认为：“我们的党是已经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党，而且仍然为与广大群众取得密切联系而斗争。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所以，哪个党的组织脱离了群众，失掉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② 因此，任弼时倡导要勤于和善于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要求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精确了解“本部门本地区上下左右的情况”，运用理论的力量，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了解内部联系，找出主要矛盾，来确定我们的方针”。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密切联系群众，关心人民疾苦，经常利用各种形式做群众工作，并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任弼时出席了兴国县团代大会。在会议休息期间，他走入代表们中间，谈笑风生，情趣盎然，一边回答同志们的提问，一边记下他们的发问。会议结束后，他不辞劳苦，要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周爱民陪他到离县城三十多里的江背、水南一带和赣县田村、白露一带调查扩红工作。在与任弼时相处的日子里，周爱民“发现任弼时同志最大的长处是没有官架子。尽管言语不太相通，但是他与群众的关系真是到了水乳交

^①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58页。

^② 《任弼时选集》，第236页。

融、亲密无间的程度”。^①丁玲回忆说：“和弼时同志在一起却不一样，他总喜欢问，而且根据你讲的一再提问……他使你敢说，什么都敢对他说。我想这是因为他长期做群众工作养成的好作风。”^②任弼时的秘书王恩茂也认为“任弼时有非常好的民主作风、充分的群众观念，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喜欢听取来自群众各方面的意见，就是一些不好的意见、反对的意见，他也愿意听。”^③正是任弼时这种亲民、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一贯作风使他得以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从而使他的许多决策和决定都建立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

1924年8月，任弼时从苏联回国后，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主要从事青年团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他非常注意调查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从1925年2月中旬开始，任弼时用了9个月时间，分别向全国各地地方团发放各类调查提纲、表格近10种，调查各地社会的基本情况和地方团组织及团员的状况。^④在此基础上，他采取建立健全和调整青年团的组织手续和机构、依斗争需要及时调整组织常设机构及职责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切实加强了团的领导机关的工作效能。

1929年，浦东农民武装斗争失败后，他们准备再进行一次武装斗争以反对敌人的镇压。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他们通过政治交通向以任弼时为首的省委请示。任弼时没有马上答

① 周爱民：《任弼时同志出席兴国团代会》，《回忆中央苏区》，第438页。

② 丁玲：《忆弼时同志》，《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74-75页。

③ 王恩茂：《他使大家充满信心和希望——缅怀任弼时的领导艺术》，《缅怀与研究》，第10-11页。

④ 蔡庆新：《任弼时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青年团的组织建设》，《缅怀与研究》，第189-190页。

复他们，而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当时在浦东一带做农村工作的刘晓所住的旅馆向刘晓了解情况，并要刘晓以一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作典型说明。他问了当时不少的具体情况，反复提出问题进行研究，还要刘晓约请当地的农民前来，并亲自与他们谈话，了解当地当时的事物、人情、敌我力量，干部与组织情况等。最后他作出了再来一次武装斗争的条件不够成熟的决定，并非常具体地分析当时的情况，说明为什么要那样决定的理由。^①

到湘赣苏区工作后，任弼时顶住“左”的压力，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对湘赣苏区的历史与现状作了全面、详尽的分析、研究，作出了与“左”倾肃反领导人完全不同的判断，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为了搞好苏区的土地革命，任弼时又深入基层调研，了解地主的剥削程度及土地的占有情况，研究没收土地的范围、分配土地的办法及其领导方式，然后制定有关文件，进行工作部署。

1938年3月，任弼时担负重任，出使共产国际。此前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王明等人奉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利用清党、“肃托”的机会，排除异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他们不满的干部，对一些同志既不让他们回国，又不安排工作，长期把他们放到基层进行劳动惩罚。任弼时发现这些情况后，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为一些同志平反了冤案。

1941年陕甘宁边区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任弼时等主张从发展经济入手来解决财政困难，并提出了盐的“官督民运”等具体措施，边区政府的部分同志对这个问题意见不一致。任弼时从调查研究入手，分别听取各县运盐队的汇报，包括出动劳力和畜力数，每头牲口驮盐的数量，沿途的饮食及草料开支，以及离盐池远近的各运盐队所获的纯利等，从中探索规律，得出“越是

^① 刘晓：《悼念任弼时同志》，《中国青年》，1950年第52期。